

谢琼桓 / 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SHOUWANG TITAN

守望体坛





守望体坛

谢琼桓 著

人民体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守望体坛/谢琼桓著.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 2003
ISBN 7-5009-2417-8

I. 守… II. 谢… III. 体育事业-概况-中国
IV. G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4658 号

★

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河北省徐水冀强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32 开本 16.125 印张 362 千字
2003 年 4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009-2417-8/G·2316

定价:30.00 元

社址:北京市崇文区体育馆路 8 号(天坛公园东门)

电话:67151482(发行部)

邮编:100061

传真:67151483

电挂:9474

(购买本社图书,如遇有缺损页可与发行部联系)

自序

乘着《守望体坛》出版的机会，通过自序回顾一下青年时代以来的生平，没有什么光荣的业绩，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经历，平平常常的往事。近40年，我凑凑合合算是中国体坛的一位守望者。这本书，可以看作守望者对体育事业的观察与思考。是非对错，任由评说。

从闽南到上海

1959年夏天的一天清晨，雷声隆隆，狂风大作，暴雨如注。

那天，我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东郊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一心一意想去实现自己的文学梦。经过1957年那场震惊知识界的清洗，华师大中文系已经元气大伤，许杰教授、徐中玉教授靠边了，施蛰存教授离开讲坛去了文史楼后面的很寒酸的资料室，三根支柱坍塌了。《红与黑》的翻译者偃旗息鼓。许广平的大学同学程俊英教授大概受了惊吓，在一次联欢会上竟把毛主席诗词“红装素裹”念成“红装素里”。

余下的还在讲坛上的有点名气的就是王西彦教授和钱谷融先生了。当然，古典文学和语言学方面还有赵善诒教授、刘锐教授、史存直教授。那时，王西彦教授不住校，偶尔来上一两堂课，又很快被批判离开了讲坛。钱谷融先生因为那篇《论“文学是人学”》，也不为时代所容，属于“控制使用”范围。你说，这种阵势下的学校还能怎样，有时真觉得惨不忍睹！

莫名其妙的是1960年春天，上海文艺界忽然掀起对修正主义、人道主义的批判。钱谷融先生、复旦的蒋孔阳教授和上海师范学院任钧教授成了靶子。那时，我才上一年级，不知道什么原因被选去上海艺术剧院听批判会，倒是见到了巴金、徐平羽、叶以群、孔罗荪、任干等名家，姚文元、戴厚英也去了，还上台批判，字正腔圆，战斗力很强。尽管我从心底里觉得人道主义不应当遭到如此兴师动众的批判，私下里同情钱先生等人，但还是不敢怀疑当局做法的荒谬。不过，亲眼看到学校名师七零八落，我对课堂能学到什么，实在不抱太大的幻想，总在自己寻找出路。

幸亏师大园环境不错，图书也还充足。入门直通河西地理馆的道路和两旁的法国梧桐，文史楼的外观特别是那几根罗马圆柱，文史楼前的绿草坪，还有颇有点灵气的丽娃河、夏雨岛，以及每天清晨喇叭播放出来的《祖国之春》，都形成一种很好的读书氛围，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按当时的标准来看，我不算是好学生。有点自由散漫，课堂不太专注，只顾写自己的东西。对当时兴起的“一帮一，一对红”，对在学生中多此一举地分类排队特反感。下上钢一厂和崇明岛劳动我的表现绝对上乘，但干部内部讨论评议劳动分数时，我对老是要给出身不好的同学评不及格尤其很难容忍。我属根红苗正，也当干部，

只是与当时的干部标准总是差一两拍，所以由团支委、学习委员、劳动委员降到寝室室长，后来就什么也不当了。

不过，在学业上我逐渐迈上了两个台阶：一个是由给《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写稿进而能给上海的《文汇报》《解放日报》写稿了；另一个是由写写散文、小小说到能写写文艺评论和社会时评了。书当然也读得更广更深一些了，除了西方经典文学名著，那时最钟情于苏联的干预生活的小说，像《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和奥维奇金的作品，都很陶醉。爱伦堡的评论也很喜欢。有时在文史楼大厅阅报栏前，忽然看到自己的作品，心里确实高兴得很。对于中文系的学生，能与同学们一起站在阅报栏前阅读自己的作品，对虚荣心是一种满足。

有一回下课，传达室通知我去南京路华侨饭店九楼开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会，乘69路车转20路车去了，慌慌张张进了大堂，看到《文汇报》编辑戈今同志，随他上了九楼，才发现《文汇报》总编辑陈虞荪同志、《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同志，还有《笔会》主编徐开垒同志都在场。戈今同志向他们介绍了我，赵超构老总亲切地说：“噢，还是个学生，我以为是个老头呢，文笔老辣啊！”大家笑了起来。这是一次座谈会，主要是围绕三篇杂文展开讨论，其中有《解放日报》总编辑魏克明同志的一篇，姚文元的一篇，还有我发表在《文汇报》上的《“把破帽，年年拈出”》。老前辈们的评论和指点，使我受到极大鼓舞。当晚在华侨饭店用餐。那是自我出生以来，最难以忘情的一次晚餐。此前我未见过这种场面。华侨饭店的菜做得确实是好，餐具也讲究。而且，那是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饭后，钱不必付，但粮票三两是必须交的。我哪有粮票？磨磨蹭蹭半天，最后还是戈今同志替我交的。回忆起来，恍为

隔世，而又历历在目。

那时穷啊，寒暑假都不敢回老家，因为买不起车票。大学五年，连随同学乘火车去苏州游春都买不起车票。记得一年级参加一次上海作协召开的会议，休息时看人家排队买棒冰，五分钱一根是买得起的，谁知排队排到柜台时发现卖的是冰砖，每块五角，思忖再三舍不得买，只好脸色通红灰溜溜地回头走掉。教育实习时学校允许买公共汽车票，凭票报销，自己舍不得乘车，然后在公共汽车站寻找乘客丢掉的车票，捡起来报销换钱。两三毛钱的事，也是不惜偷偷用尊严去换取啊！

“早晨阳光灿烂，金色的丽娃河多么宽广，一片片绿阴，一垛垛红墙，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站在红桥上眺望，美丽的花朵遍地开放，一条条游鱼，一只只飞燕，回旋在我们的小岛上。啊！美丽的师大园，是我们学习的好地方，是我们生活的乐园。”这是一首学生自编自演的歌，虽然有些夸张，有点“小资”，但今天回想起来，也盈盈在耳。青春作伴，激情满怀，那是多么好的时光！

丽娃河负笈，前后五载，追求的是一个文学梦。给柳青写信，给杜鹏程写信，都得到他们的回音。给何其芳写信，也得到他的鼓励。怎么也想不出姚文元后来会变成那样，他在《解放日报》任职时，我们也通过信。就《创业史》的问题，曾与李希凡有过不同意见，柳青回信让我别“缠在那里”。总之，千方百计想从文艺阵地打开一个入口，但资质有限，才情无多，东冲西闯，也未见有多少起色。就这样，五年一年一年地过去了，到了毕业分配，“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歌曲一唱，热血沸腾，未来如何，听天由命吧！

从上海到武昌

1964年夏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我揣着毕业证书挑着两个当时工厂用来装肥皂的纸箱到十六铺码头上船，纸箱里装的是几本从福州路淘来的旧书和一些备用的杂志，几件不入时的旧衣物。五年前从闽南到上海，我仅在上衣口袋插把牙刷就上路，五年后添了两个纸箱。轮船从黄埔江出发，随着一场气笛的鸣叫，眷恋与向往交织在一起，我眼眶潮湿了。别了，第二故乡——上海！别了，美丽的师大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轮船的甲板上，望着吴淞口江海交接处，烟波浩渺，逝者如斯，我翻开阅读笔记，恰好翻到了记录下来的维克多·雨果《九三年》中几段文字，并迅速从字面上产生一点联想：

思想意识也是一种营养。想，就是吃。

（读到这里，我想，不能让头脑老闲着，思想营养应如同一日三餐一样。）

西穆尔登：“还有孩子呢？把他交给谁？”

郭文：“首先交给生他的母亲，然后交给育他的父亲，再交给培养他的先生，再交给使他长大成人的城市，然后交给最高的母亲——祖国，再交给伟大的祖先——人道。”

（读到这里，我想，父亲已经先去了天国，没有交成，母

亲和先生，已经交过，现在到了后三阶段了。)

郭文：“我的想法是：永远前进。如果上帝要人后退的话，他会使人的脑后长着眼睛。我们必须永远朝着黎明、青春和生命那个方向看。倒下去的正在鼓动站起来的。一棵老树的破裂就是对新生的树的号召。每一个世纪都有他的使命。”

(读到这里，我想，我应当永远朝着黎明、青春和生命的方向看去。)

郭文：“我要的是蜂巢蚁穴里所没有的东西，像纪念碑、艺术、诗歌、英雄、天才。永远背着重担并不是人类的规律。……人生下来不是为了拖着锁链，而是为了展开双膀。”

(读到这里，我想，我也应当展开双翅，寻求蜂巢蚁穴所没有的东西。)

不要谴责不应当谴责的。从什么时候起疾病成了医生的错处呢？割掉毒瘤就需要流血。

(读到这里，我想，在人生道路上，我不应讳疾忌医，千万别做死不认错的人，少埋怨，多理解。)

轮船逆流而上，穿过金陵，越过芜湖、九江，最后停泊在汉口武汉关。“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挑着两个纸箱直奔目的地。到了武汉体育学院，很快就按照规定去

了王任重蹲点的孝感县搞“四清”，后来又去了荆州继续搞“四清”。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真心实意劳动锻炼，参加“四清”运动。如果说我在这场运动中能够踏实肯干却又能适当与“深挖细找”“穷追猛打”拉开距离，那应当归功于我从小在泥土疙瘩里摸爬滚打，深知农民的景况和无助。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同情多于怨恨。有的人抓住一点什么，就“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非要弄个鱼死网破，到头来没有不过了头再进行甄别的。这场运动中的一些反复无常现象使我踏入社会便体会到留有余地比拿人往死里整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同时我还领悟到“冷处理”的妙处，这也为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扯大旗、不打头阵打下了思想基础。

1966年春天我从乡下回到学校，那时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已经发表，接着是《评“三家村”》。起初我天真到想写一封信给姚文元，劝劝他别将吴晗和我的老乡邓拓的文章上纲上线，“留给他们一条生路”。信写好后三次想投入邮筒终于又住了手。后来姚文元青云直上，“阶级斗争为纲”的苦酒愈煮愈热，我庆幸自己没有“跳出来”，庆幸也没有将在上海期间姚文元给我的信拿出来张扬。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我基本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的态度。有时也心惊肉跳，害怕不积极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我还是坚守一条：不进行政治投机，不装“最最革命”，不想从中捞取好处。好在出身不错，过去写过的文章武汉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出来揭发和批判。什么“红一司”“红二司”“红三司”，什么“百万雄师”，我不参加。工人阶级家庭出身，你能拿我怎么样？有这点底气，可以不作忽亢忽卑的跳梁小丑，不作随风倒、扇自己耳光的墙头

草，不作趾高气扬的造反英雄。你们在台上吆五喝六，威风凛凛，我坐我的冷板凳，悄悄读我爱读的书。《古希腊罗马哲学》《新工具》《苏格拉底的申辩》、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以及《君主论》《实践理性批判》《居里夫人传》，还有莎士比亚、巴尔扎克、雨果、海明威、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红楼梦》《第41个》《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本本地啃，懂多少算多少，总比疯狂喊口号、贴大字报有益，总比“昨日的佳人，今朝的丑妇”或“昨日的丑妇，今朝的佳人”自在。真的，平平和平，不虚荣，不钻营，不趋炎附势，感觉还是不错的。

70年代小平同志复出之后，《体育报》也复刊了，体育界开始有点行业声音了。我一边上点大学语文课，后来又上点体育社会学的课，编编学报，做做科研行政工作，一边给《体育报》《长江日报》《湖北日报》写写稿，练练笔头。湖北省组织写作小组，总结武重、武锅、武船、武钢的经验时，驻武汉体院工宣队指挥长、武汉空军文化部长马国昌同志极力推荐我去参加。在与武汉大学、华中工学院、华中师院的老师们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学到不少东西，也树立了自信心。当时住在东湖边的曹家花园，据说周恩来总理曾在那儿住过，所以心理感觉就非常好，写作状态也较佳。

粉碎“四人帮”之后，禁不住文学的诱惑，曾经联系好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当代文学，由于体院的极力挽留，没有去成，后来也就下决心在体育领域竭力做点像样的事，第一个半生不熟的成果是对体育的性质、功能和所谓阶级性的传统说法提出质疑，于是引起体育界的一次大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传统体育观念的一次不大不小的颠覆。接着论述了体育的

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的关系，再接着是对体育的商品性作了较客观的阐述，不同意将体育的商品性看作社会主义国家的体育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体育的分水岭。这些观点，在体育理论界都产生较广泛的影响。如果说从此奠定我在体育学术界的一定地位，似乎也无不可。

80年代上半期，国家体委和一些职能部门，包括《体育报》社，经常给我提供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如参加某些座谈会，参加全运会采访和评论写作、出国考察等。1983年调我进京参加荣高棠、黄中同志领导下的《当代中国体育》的撰写。当时张彩珍、吴重远、毕世明同志也都参加了。半年下来，使我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对体育涉及的领域有了一个基本的轮廓，这也为我日后的宏观思考打下了基础。

在武汉体育学院工作20年有余，那是我风华正茂的时候，尽管遇到十年浩劫，无端耗费了许多时间，但毕竟在如诗如画的东湖之滨走出人生的一大步，有一批亲密的同事，有一批志存高远的学生，有一批江城武汉的好朋友。他们给我关心、支持和鼓励。我怎么也忘记不了1984年胃溃疡开刀，几十辆自行车停在医院门口，几十位师生在寒气袭人的冬日等待着我的生死抉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得意还是失意，我都得到他们足够的帮助。我不是那种此山更望那山高的人，也不是那种很能主宰自己命运的人，我从不会刻意去追求什么，倒是倾向于“一切听从命运的安排”。本来以为，今生在武汉安家落户，教点书，写点东西，当个差强人意的教授，于愿足矣，哪会想到，1985年我的命运又发生新的转折。

从武昌到北京

1986年春天，春暖花开，春光明媚。在一个云蒸霞蔚的傍晚，我乘38次列车从武昌到北京，奉调到国家体委政策研究室，参加组建理论处，并担任第一任理论处处长。

事实上，1985年黄中副主任就与武汉体院打过招呼，这说明在撰写《当代中国体育》期间，我给这位领导人留下的印象不错（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因公务繁忙未能主持他的传记写作，他曾亲口答应要带我到他老家东北看一看他在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再加上张彩珍、易厚高同志的积极运作，我于1985年冬就先借调来京。

工作了大约三个月，我深感机关工作的繁琐，一个小房间坐四五个人，面对面，背靠背，很难认真思考点什么，而我在大学里已经习惯了那里的工作节奏和工作环境，再加上实在舍不得大学里几十年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舍不得年年送走一批心爱的学生，而迎来一批恭恭敬敬的新生的情景，舍不得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和知识分享的快乐。

1986年春节回武汉过节之际，我打算卷铺盖打道回府，没有想到彩珍同志、厚高同志领我到李梦华主任办公室。彩珍同志说：“好容易才调入北京，你还想回去，你窝在那里干什么？这里毕竟机会多，工作范围大。”我说：“学院党委不是还没有讨论么？”厚高同志作为人事司长，有点急了：“上级调动，讨论是一个程序问题，我们正在办，你没有退路了！”梦华主任最后亲切地说：“你还是来。不坐机关，这里还有报社、研究所，将来都可以考虑安排。换一个工

作，一开始不习惯，过些时也就习惯了，哪一个人不是听从党安排。”中央委员、部长这么说了，我能抗拒不遵么？并非谁都能遇到这样的关切和开导，我再愚钝，心里还是明白的。

来到首都，作一个首都市民，心里感觉当然很不错，别说是历史古都，雄伟壮丽，“气吞万里如虎”，就说人文荟萃，群贤毕至，“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就足以抚慰人的心智，给人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体验。

十多年来，除了90年代有三年多在中国体育科学学会任职，余下的都是在原来的政策研究室，现在的政策法规司工作。回顾起来，这些年真是经风雨，见世面，毕竟活动舞台大了，正如人们所概括的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职位低、层次高，做的是服务性工作，完成的是领导工作”。作为公务员，确实有自己的职业要求，比如必须忠诚尽职，勤奋工作，服从命令，讲求效率，不得怠工、越权、抗命、推诿，必须忠诚老实，不欺上瞒下，不滥用职权诬陷他人或营私舞弊，等等。虽然像我这样比较惯于个性写作、个人思考和喜欢自由的人，做公务员无疑是一种挑战，但人的习惯并非是不可改变的。既然决心在国家机关工作，我也就只能努力使自己适应职业的要求。幸亏领导人都比较开明，比较宽容。在不违反组织纪律的前提下，我还是有适当的个人思考、个性写作的活动空间。

十几年来除了参加体育政策制定、体育法规建设和完成委领导、局领导交办的工作之外，按照职责范围我还保持着与体育学术界的长期联系，在我的同事的积极配合下，推动体育人

文社会学和体育发展战略研究。虽然在学术上我已不可能进行系统的、专门的、深入的研究，但十余年接触体育高层决策过程，耳濡目染，无论是80年代李梦华主任、90年代伍绍祖主任、新世纪袁伟民局长和李志坚书记，他们的体育理念、政策主张，在大的方面我都不是十分陌生，起码能够了解其基本轮廓，并在我的职责范围内努力去贯彻执行。我觉得，在行政工作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认识，也是进行学术思考的一笔财富，这就是为什么我近几年敢于在没有讲稿的情况下与体育学术界包括体育人文社会学的硕士生、博士生进行交流，并即席回答他们提出问题的原因。有可能在这样一个大国、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这个岗位上工作近20年，无疑是令人羡慕的难得的机遇。任何人有此机会，都会有相当的心得，都会比我做得更好。所以，我一直心存感激，感激国家和人民。至于个人能力的大小，贡献的大小，都不值得夸耀和自诩，倒是应该扪心自问，哪些方面还做得不够。

令我甚为珍惜的是，在担任中国奥委会、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评审组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组等社会职务时，我有可能与国内外体育界的知名人士，与全国科学技术界、全国社会科学界和教育界受人尊敬的前辈和杰出专家教授一起工作，相互结识，从而大大开阔了眼界。与各界的社会贤达、知识精英面对面，使我懂得学无止境，懂得“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懂得操守，懂得任何成功都必须用诚实的劳动来换取，懂得“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懂得大道无术、大音稀声、大智若愚。“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人不就是这样逐渐成熟、逐渐成长起

来的么?!

来到北京，处在这个位置上，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在办公室静坐，总是要出去开会，出去参加一些活动，出去调查研究。每到一地，都会遇到一些熟人，结识一些新朋友，都会得到他们的关心、帮助和热情款待。每年元旦、春节前后，都会收到各地朋友们的贺卡，平时也常会收到各地寄来的信件、杂志、电话。由于手头的公务，也由于个人处事粗疏和不够勤谨，有时一走了之，一收了之，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招呼，很少回音答复。对此这些年成了我的一块心病，总觉得很惭愧、很内疚，仿佛欠了一笔还不清的债。尤其是受聘担任一些大学的教学、科研职务，因种种原因，未能充分履行职责，内心甚是不安。我有决心在离开行政岗位后竭力补救。与青年学子切磋学问，听听他们的知识诉求，我感到有一种难得的愉悦。

美国著名的聋哑作家海伦·凯勒写了一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非常动情地描述她想要利用这三天光明做些什么事。我有时也会想，假如生活可以重新来一遍，我会切实纠正自己的缺点、弱点，把过去那些应该做而没有去做的事做了，把过去应当做好而没有做好的事重新做好。我会更加努力，更加勤奋，更加忠于职守，用自己微薄的力量负起应尽的责任，为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效力。可惜的是，这些想法都只能是一种愿望了。

最后，我要感谢母亲的哺育，感谢老师的教导，感谢领导人的信任和指点，感谢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鞭策，感谢那些忘年之交的青年才俊的鼓励。那热情的眼光，温暖的双手，真诚的期待，值得我永远铭记在心。

我青年时代以来的命运一直不错，在工作上、事业上总是有人扶持帮助，许多事情都水到渠成，用不着刻意去追求什么，也用不着低三下四去迎合什么，无论是行政上还是学术上，国家给我的职位、地位，与我对事业的贡献相较，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的心境一直比较好，看人看事大都是光明的、美好的，所以，我总是比较乐观，生活态度也还积极，思想虽不算前卫也还不落后于时代。人生能够如此，也就不虚此行了，对么？

二〇〇三年二月于北京